

周作人——宣统三年辛亥夏的回国

松冈俊裕 著 松冈俊裕 李丹丹 译

关键词:周作人,鲁迅,日本留学,羽太信子,辛亥革命

序章

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周作人（1885——1996）与为奉命完婚（与同乡出身婚约者朱安）而临时回国的兄长鲁迅相伴，首次踏上日本国土。这一年清国的留日学生人数继上年之后又创最高纪录。周作人便是新来留学生中的一员。

两年前的冬天，周作人升入江南水师学堂（相当于日本的海军兵学校，在南京）的最高年级。课程虽说依旧马虎不尽如人意，但是既无留学又无转校预定的学生们只能继续在该校学习。一年后，北京练兵处要派遣学生赴日本学习海军，赋予各省选拔权。学生们一方面要求学堂负责任地推荐学生，另一方面各自向本省的负责人递交请求采用书。然而后者基本上石沉大海，前者也并没有一定的推荐规则，结果由北京练兵处进行直接选拔。周作人专业考试合格，但因为眼睛近视身体检查落第，未能上京。三、四月份左右对前途失去希望而抑郁消沉的周作人又见希望之光。两江总督周玉山在视察之际顺便到学堂，由于他的斡旋，以江南督练公所（南京）的名义派遣周作人赴日学习建筑学。当然这也是名义上的。其真正目的是让他与兄长鲁迅一起从事文学活动。此次日本之行，除了鲁迅外尚有一名同乡出身的同行者，旅途十分愉快。途中在上海，周作人与另一名新留学生一起剪掉发辫，并无视尊重“字纸”的习惯，在厕所里两人一如既往地使用了报纸，因而遭到其他客人的厌恶，显示了当时留学青年的血气方刚之处。他们到达东京是数日后的傍晚。

周作人结束前后六年的留学生活，与在东京娶的日本女性羽太信子（1888——1962）一起回归故乡绍兴（浙江省）是清末宣统三年（1911），迟于鲁迅两年。以此次留学为契机周作人成为中国少数的优秀日本理解者之一，此后四次访问了日本。

第一次渡日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国八年（1919）四月至五月，周作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丰一、静子、若子到东京的羽太家。本来准备顺便去九州宫崎县的新村，但因接到了“五四运动”勃发的通知，周作人匆忙只身回国。第二次是同年七月到八月，去了一直打算去的新村，在宗教式的兴奋中体验了人类之爱后，带着妻儿和妻弟归国。第三次是在声讨日本的舆论日益高涨的民国二十三年

(1934)七月到九月，与信子两人在免受关东大地震破坏的、保留着明治末期风貌的旧本乡区菊坂町的某旅馆逗留数日。这次来日的目的是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购入日本文学讲座用书。来日期间与同行的徐祖正被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大会邀请到山水楼(岛崎藤村同席)，又被藤村邀请到六本木的大和田共进晚餐(和辻哲郎、有岛声马同席)。这是周作人期待日本的良心、相信日本文化会净化呈现野蛮现状的日本本身的时期。最后一次是中日战争开始后的民国三十年(1941)四月，他作为会长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大会先赴京都，同时作为汪兆铭政权下的新任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督办与该会有关人员进行了交流。后在东京出席了日本笔会主办的以自身为中心人物的日本文坛人士的聚会。此时他的复杂的心境，在《知堂年谱大要》¹中的“旋即回京”的字样中可以充分体察出来。

这五次渡日每次都对周作人有着重要意义，每次回国的原因都有值得我们思考的价值。其中构筑了日后学术基础的与思想之“核”的明治末年的归国的意义的考察，是分析解明周作人被所爱日本蒙骗，最后被定罪汉奸的过程的不可缺少的一环。本论欲通过探索归国时周作人的动向，对周作人如何以归国为契机，作为启蒙者并日本文化理解者开始了新的出发这一内容进行阐述。

第一章 归国经纬——周家经济上的不如意

此次归国并不是周作人自身的意愿。周作人本想继续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但因周家经济状况不如意不得被迫回国。当时周家的经济实际上由兄长鲁迅支撑，因而周家与周作人的对立实际上表现为鲁迅与周作人，即兄弟间的对立。这仿佛是日本的德富苏峰芦花兄弟不和的中国翻版，可以看作招致日后可悲的兄弟失和的最初的兄弟间的纠葛。只是此时鲁迅让周作人回国的态度坚决，周作人因长期接受鲁迅学资资助感到内疚姑且回国，所以事态并不严重。然而这个纠葛单从周作人学业继续与否与周家经济状况的联系这种表面上来理解是不够的。从周作人一方看，应当有在留学日本之背景下产生的脱离鲁迅的精神上独立的意义；从鲁迅一方来看则有试图从甘愿为弟弟、进而为家庭的牺牲中解放自己的尝试。本章将主要阐述鲁迅一方的情况，下一章主要阐述周作人一方的情形。

(1) 家族没落与游学

周家的原籍是湖南省道州。周氏兄弟十四代以前的先祖逸斋公带着两个儿子移住绍兴时是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此时已由农业转商业的周家渐渐积累起财富，第六代韞山公考中举人，从而进身士大夫阶层。第八代寅宾公有三个儿子，分为致、中、和三家，后致房又分为智、仁、勇三房，智房进而分为兴、立、诚三房。周氏兄弟的祖父介孚公(1837——1904)属于长房智兴房。

周氏兄弟自懂事起周家已经呈现衰退迹象，只有长房还比较有势力。这是因为介孚公进士及第(1871)，在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知县等职后到北京担任了政

府官员（内阁中书）的缘故。父亲伯宜公（1860——1896）也是秀才，外祖父晴轩公是举人，其两个儿子亦是秀才。伯宜公是所谓的万年秀才，每三年参加一次乡试（杭州），过着坐吃山空的生活。介孚公也变卖田地买官（内阁中书）娶妾，浪费成癖，向家里分文不交，致使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破坏的房屋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也得不到修缮。虽然如此，鲁迅在《著者自叙传略》（1925）中说“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一家的主要收入便是这大约三公顷土地的地租。周家作为典型的地主阶级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打破了智兴房安稳生活的是介孚公所为科举作弊事件。1893年介孚公辞去在京官职，带着妾潘姨太太、亡妾章姨太太所生子伯生（1882——1918）回归故乡。在当年的乡试时，为参加考试的亲友与熟识的主考官搭关系，在将这些人凑的一万两向主考官行贿的阶段事发。当时调查这件事的苏州府知府本想将此事不了了之，但此时介孚公举报了一些收买考官而中举的人的真实姓名，并声称自己不过“学习”了他们的做法而已，致使此事转交浙江省直接审理。科举考试作弊，特别在清朝有着严厉的处罚方针，如果是双方勾结，那么双方均为死刑，有时为了一起事件判处十几人死刑。清朝末年，这种严惩方针有所缓和，介孚公被处“斩监候”（“斩”即死刑。死刑分“监候”和“立决”，“立决”为死刑立刻执行，“监候”为关进监狱，最终减刑），在杭州府监狱坐牢七年后受到特赦返回绍兴（1901）。就这样，智兴房在奠定了其繁荣基础的介孚公手中迅速没落下去。

始于第二年冬的伯宜公的患病和离世（1896）加速了周家的没落脚步。周家所有田地在伯宜公发病时已减至二十余亩（一说二十九亩²——不到二公顷），其收入只可糊口，医疗费等只好通过不断去当铺变卖东西碾出。仅医药费一项，在当时隔日出诊通常一次出诊费含轿费共为一元四角，这个负担就相当大。

这样经济上的不如意对周氏兄弟将来的影响也很大。伯宜公去世后，没落已成定局的周家已经不允许坐吃山空，托在江南水师学堂校任汉文教授兼任监督的同族椒文，伯生（1897）、鲁迅（1898）、周作人（1901）先后进入该校学习。当时绍兴有新创立不久的私校中西学堂，

教授国语、数学、英语、法语（1899年改编为绍兴府学堂）。虽然不太清楚该校的学费情况，周氏兄弟一开始就没想进这家没有什么特色的新式学校。另外还有继承江南制造局宗旨的求是中西书院（1901年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在杭州）、格致书院（在南京）等书院系列的学校，教授一般自然科学。这些学校虽然免除学费³，但是之外的伙食费等要自己负担，周家没有负担能力。与此相对，设立于天津、南京等地的海陆军学校，在中国“好人不当兵”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报考人数极少，因而这些学校学生都不仅享受公费，每月还可以得到津贴⁴。周作人在学时免除学费、伙食费、住宿费，衣服、鞋、书籍、用具由政府发放，此外第一学年领得津贴每月一两。以此来看，鲁迅等的游学，在结果上起到了减少智兴房吃饭人口的效果。

周氏兄弟的留学如果不是享受公费必定不能成行。当时公费留学生的支付金额为：旧制高中毕业进入帝国大学者，每年五百日元，进入帝国大学选修科和国立高等专门学校者四百五十元，进入此外的帝国大学普通科、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学习者四百元⁵。当时留学费用的支取管理松弛，“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过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⁶”。周氏兄弟最少每年得到四百日元，即每月得到三十三日元⁷。

鲁迅兄弟在南京、东京的两个游学时代，经济上没有家里资助，仅靠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公费和极少的翻译（打工）收入，过着贫苦的学生生活。这也是暂时可以不考虑家里经济状况的时期。然而或早或晚，长子鲁迅要成为一家顶梁柱，担负起众人的期望和家庭责任，必须归国的日子都要到来。

（2）鲁迅的归国

周作人渡日后的第四年（1909）夏天六月，鲁迅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只身回国，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初级和高级）师范学堂奉职。在这里，鲁迅活用仙台医专学习的知识，教授生理学、化学，并兼教日语翻译。这份职业是东京弘文学院时代相识的好友许寿裳介绍的。许寿裳原本在年初已经决定了去留学德国，但因一九〇七年以来负责留欧学生管理的蒯光典辞职，致使学费无着落而于同年四月回国，就任该校的教务长。正如鲁迅在《著者自叙传略》中所说的“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人（作人夫妇——引用者）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一样，其回国理由之一是上文中提及的家里经济状况的不如意，促使其回国；理由之二是进入立教大学开始希腊语（3月）后不久于羽太信子结婚（5月）的周作人要继续其留学生活，无论如何需要鲁迅的资助。鲁迅托即将回国的许寿裳引荐职位时所说的理由只有后者⁸，因此可以考虑《著者自叙传略》所说未必尽是事实，鲁迅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对周作人进行经济上的援助，这一点不会错的。事实上，仅用一个人的留学费用每月三十三日元支付夫妻二人的生活费是不可能的。鲁迅因意想不到的理由而不得不回国。

许寿裳认为“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做事。”⁹。然而鲁迅对学术研究报告有的热情是不是到了要用“牺牲”一词还是个疑问。鲁迅确实到当年年初为止，与许寿裳同样去德国留学基本已成定局¹⁰，此时他也正为了可称之为《新生》文学运动的翻译部门的《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全力以赴地工作，并且利用擅长的德语，倾注热情欲将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文学精神引入中国。然而德国留学之梦终未成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2月）也仅卖了二十一册，反响极微，在多少有些消极的情绪下好友的归国日期迫近，这种情况下，鲁迅极可能由某种隐隐的寂寞感而产生了回国也无所谓的念头。促使鲁迅下决心回国的是周作人结婚一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作人二人回国而自己单独留下，而两个人的留学费用六十六日元也无法养活三个人，家里的资助全无指望，那么最好的方法无疑是三人都回国。但是周作人希望结婚后继续希腊语的学习，恳求鲁迅给与支持。受

了作人之托的鲁迅甚至赞扬了作人的求学欲望，为了保证二人的爱情生活决心回国。虽说鲁迅很遗憾自己的文学活动未曾取得任何反响却不得不回国，但他的回国也决不是十分勉强的。

（3）鲁迅的再次渡日

杭州两级师范学院任职时期的鲁迅依旧保留着留学时代的血气和热情。他应学生们的要求在当时破天荒地开设了生殖系统讲座；编辑了生理学讲义用教科书《人生象学》；带领学生外出采集植物标本；熬夜阅读文学书籍。回国一个月后，鲁迅在为“真实的代价”（《病后杂谈之余三》。1935年）作好了精神准备的前提下扔掉了归国当初为了慎重起见而戴的假发辫。这个时期鲁迅这样意气风发的原因推测为①刚回国不久②教师中有不少如好友许寿裳、夏丐尊等留学归国者③校长是法政大学出身的进步人士沈钧儒。象征着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的是当年冬天发生的“木瓜之役”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沈钧儒调任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代之以夏震武。夏震武是个守旧的道学者，强制教务长许寿裳礼拜孔子像，对一般教员也摆架子逞威风。许于气愤之下向前任校长沈提交辞呈，之后其余的教员要求总辞职。这个新旧校长交替间发生的冲突事件的结局是，“夏木瓜”校长辞职，教员们重返学校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木瓜纪念会”。然而，详细的情形虽不太清楚，可能这起事件使他们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到翌年的辛亥年秋为止都辞职离校四散而去（或许受到了教育界保守势力的干涉）。祖母蒋老太太死后（5月）不久辞职返回老家绍兴的鲁迅，在给赴北京的外国语学校奉职的许寿裳的信中这样写道：

手毕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协和未识安在？闻其消息不？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庇足于是尔。……（中略）……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¹¹

从杭州隐退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的鲁迅已萌生了逃离故乡的想法。“木瓜之役”、深爱的祖母之死以及好友四散的打击，加上乡人把自己视为从日本回来的披散头发的“假洋鬼子”等原因，使此时的鲁迅失掉了归国当初的血气，也无学术研究的意欲，他欲向他方寻找生活之路进而重建荒废的精神家园。只是当时并没有别的合适的职位，而要维持生活又需要一定的收入，因此虽然工资微薄也只好暂时屈就了。

然而中学堂教员的生活使鲁迅更加精神颓废。其中作了监学之后，围绕着实施考试而发生的学生骚动是促使其决心辞职的直接原因。

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¹²

事件风波渐渐平息后，鲁迅邀北京的许寿裳前来希望共同开拓推广越学从而找到新的希望，但是当时并未成功（后来成立了“越社”），此间也托友人斡旋职业均无结果。为了生计又不能立即辞去中学堂的工作，这样不明朗的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即使为了辞去中学堂的职业另觅他所也需要周作人回国。

且说持续恶化的周家的经济状况，因鲁迅微薄的收入基本用于资助了弟弟夫妇，所以不但不见好转，相反到了不得不卖掉所有田地的地步。鲁迅具体的工资金额虽不清楚，但从许寿裳北京的外国语学校工资八十元，数年后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任职时工资为六十七元的状况看，可以得知每月寄给¹³弟弟夫妇六十元是如何的负担。

鲁迅这样的心境和周家的经济情形周作人仿佛不知道，向鲁迅提出希望学习法语。

起孟（作人字——引用者）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¹⁴

鲁迅兄弟俩留学时期很看不起不屑于文学为了追求实利只努力学习法律、铁道、警察、监狱等学问的留学生（形容他们为“眼睛石硬”）。两人致力于“无用的学问”（《摩罗诗力学》）——文学的留学时代可以说是“梦”的时代、“梦”的世界。然而为了让周作人留下（此时起“梦”的世界开始成为“过去”的世界）学习与实际利益无缘的希腊语，只身先回国的鲁迅所迎来的“现实”世界超乎预想地严峻，何谈“梦”的实现，连在“痛苦的沉默”中梦想“梦”的世界都不得不作罢。“梦”在“现实”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处于此现实中的鲁迅因此受到重创，他不得不让周作人也来承担一部分。因而先让周作人从“梦”的世界——对鲁迅来说是“过去”的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成为必须。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的“现实”便是他自己所处的令人厌恶的故乡，虽说那里旧态依然，但鲁迅决未把它看成“过去”的世界。

将家里最后所剩的祭祀用的共有田产也分期变卖后，四月左右，鲁迅终于离开中学堂，给友人张协和翻译了心理学方面书籍后，五月前后，为了催促作人夫妇回国前往阔别两年的日本。此时作人以“因家务关系”为由从立教大学中退有一个多月。鲁迅在日停留半个月左右，其间“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仅一看丸善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¹⁵”。这是因为“闭居越中，与新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¹⁶。从此可见鲁迅虽然被“梦”的世界所吸引但最终却不得不忍痛割舍的复杂处境和自嘲性的悲哀。然而不愿回国的周作人的意志也很坚决，可能两人因此在感情上也留下了芥蒂。《知堂回想录》中对此次

回国全无记载暗示了这点。

然而总之无论如何大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间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结伴回国¹⁷。

第二章 留日体验——对日本文化的倾倒与恋爱成功

南京时代的周作人一方面是个朋友众多、计划着与学堂同学参加拒俄义勇军的热血青年，另一方面又有着多愁善感的一面，比如他由于政治和恋爱问题的烦恼而开始读佛经，在孤独的寂寞中奋起写作处女作小说《孤儿记》（1906）等等。可以说是处于狂风巨浪的漩涡中时期。与此相对，日本时代的周作人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刺激感情起伏的事情，精神安稳，生活愉快（或许是因此他六年间一次也没有回国）。他既没有受到寄宿处主人或警察的侮辱，也没有像鲁迅一样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刺激，这使他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度过鲁迅归国前（前期）的、公私两处皆处于鲁迅庇护下的、与鲁迅的共同生活，也使他以同样的心态度过鲁迅回国后（后期）与爱妻信子的和谐的夫妇生活。只是下面要论述的周作人 cross-culture-experience，在前期和后期截然不同。用一句话说，前期基本上封闭于自己的世界中，后期开始走出封闭。他所描述的“梦”的世界，也基本是依据后期的留日生活经验而形成的。总之，他心目中的日本限于明治末年的东京，后来他把东京称作“第二故乡”。

（1）前期（1906-1909）——新生文学运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秋，与鲁迅一起到达东京的周作人寄宿于旧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中下等的专门寄宿宿舍（下宿）伏见馆。之后兄弟俩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迁居离伏见馆不远的旧本乡区内家庭寄宿宿舍（素人下宿）中越馆。又在翌年春与许寿裳、钱家治、钱家治亲戚朱谋先三人合租旧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七号的旧夏目漱石宅，取名“伍舍”（邻家为幸田露伴宅）。同年冬“伍舍”解散，兄弟俩与许寿裳搬入西片町波字十九号的一栋独立住宅（房东是顺天堂医院院长佐藤进），与在这里帮工的羽太信子相识。从根本上说，周作人在高度赞扬明治维新以来以西洋为范本的日本的模仿文化的同时，认为既然来留学就更应该关注日本特有的生活习惯。事实上他也很快适应了日本的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这首先是由一个人的秉性和习惯决定的。

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¹⁸

其次这也是由尊崇产生民族主义的清朝或者元朝以前的事物的思想感情决定的。

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¹⁹

他喜欢木造纸张贴的朴素简便的四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喜欢以蔬菜和鱼虾等为主的清淡伙食，认为袍子、马褂是胡服而爱穿和服，讨厌人家叫他清国留学生，写信的时候一定用印度对中国的美称支那。第三，这也因为他喜爱中国人缺乏而日本人具备的“清洁”、“有礼”、“洒脱”。他特别赞美与伪善、淫乱毫无关系的、自然天成的“天足”，喜欢赤脚穿闲舒自然的木屐，这是由于他厌恶中国的缠足恶习而来的嗜好。当然周作人对日本生活习惯的更深的关注和倾倒是与羽太信子结婚以后。

周作人在对日语与日本文学的关心方面有着这样的内情。在东京最初的二、三年间，周作人虽然在旧神田区骏河台的中华留学生会馆主办的日语讲习班、旧曲町区富士见町的法政大学分校开设的“清国留学生预科”²⁰等处学习基础日语，但是无论什么事情，日语精湛的兄长鲁迅都代为处理，周作人一个人出门的情况是极少有的。因而他的日文会话能力也没有多少长进。另外，每日必读的报纸（《读卖》和《朝日》）的新闻报道程度的文章姑且不论，至于文学作品，虽说受鲁迅影响，直接接触了活生生的日本新文学潮流，读了夏目漱石、田山花袋等的作品及岛村抱月等的评论，但是就周作人来说，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充分理解这些作品的实力。他平时主要阅读英文书籍。

周作人留学的最初时期，利用江南水师学堂时代学得的擅长的英语，作为几乎算是唯一的支持者，参加了鲁迅发起的《新生》文学运动，这可以说是他留学初期的特征。从《新生》（未发行而夭折）的准备阶段到可以称之为其翻译篇的《域外小说集》发行期间，周作人留下的数篇文章的大致论调都没有超出鲁迅的主张。首先，排除当时流行的、梁启超式的教训主义背景下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提倡文学的特性只在于“移情”的现代文学观（《红星佚史》序²¹）。其次，用文学之“药”治愈失掉“真诚”只求保全躯体的精神失落的中国现状，振奋“民气”（《读书杂拾》[二]²²）。第三，将俄国的克鲁泡特金等虚无主义者作为去除虚伪振兴衰败的“求成之士”来赞美（《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²³）。最后，痛斥沾染了只学实际学问，欲以此谋求实利的抱有富贵利禄思想的留学生（《见店头监狱书所感》²⁴）。只是有一点不能忘记，周作人在作家意识（新文人意识）支配下，欲以文学改造中国社会而救国的形象的确立是在雨果的人道主义影响下写就的小说《孤儿记》之时。他的文学基调带有对悲惨状况下事物的无限同情与对文学本身的强烈关心的色彩，这使他的目光不止停留在关注寻求自由的俄国文学和寻求民族解放的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上，而是更广泛的关注着西洋人道主义的源头《新约全书》、左拉、莫泊桑等的自然主义、英国王尔德等等。

(2) 后期(1909——1911)——倾倒入日本文化与恋爱成功

a 与羽太信子结婚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恋爱前曾经有过两次恋爱经验，这两次恋爱都已单相思的形式画上了终止符。初恋是十四岁时，为了照顾收监于杭州监狱的祖父周家人暂居于花牌楼。有个女孩

每次来玩时，必到周作人处，抱着猫看他写字。周作人自知是“丑小鸭”，但是他对这个小自己一岁的姑娘杨三姑娘产生了淡淡的爱恋之情。然而未曾与她说一句话，他便回了故乡，她死于霍乱，这段幼小时期的恋情就结束了。第二次恋爱是此后的一、二年后。舅舅的独养儿子鲁延孙结婚，许多堂表兄弟姐妹参加了婚礼。其中有个与周作人同年同月生的堂姐，两个人互称对方姐姐、哥哥。“丑小鸭”对这个已有父母决定的未婚夫的堂姐产生了“分不相应”的感情，曾经神差鬼使地披上她的雪青纺绸衫跳舞。对这位堂姐的感情后来也没有消失，南京时代的日记中写有许多伤感的语言（据说此后马上都剪掉了）。辛亥年回国时，她已出嫁，并且抱病在身，面临死亡。其间两人见过数次，作人去北京（1917）后不久堂姐去世。作人母亲鲁太太是她的干娘（虽未经过仪式），她给鲁太太留下一张照片。或许她对作人也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人互诉衷肠的场面也可能发生。如果是这样，这无疑可以看作是一个悲剧的恋爱故事。

周作人背负着失恋之痛渡日，数年后于羽太信子相遇。与羽太恋爱的成功治愈了他失恋的痛苦，消除了他的自卑感，使他精神安稳。另一方面通过阅读霭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使他在妇女解放观上拥有了鲁迅所缺乏的性解放的视点。

《留东外史》记载，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与寄宿处房东的女儿或者在此帮工的姑娘“游戏恋爱”者不占少数，而且大多数都以姑娘被抛弃结束。像作人这样真心恋爱进而结婚的事例是很少的。

然而且不说羽太家意向，故乡鲁太太的复杂心境就不难想象。鲁太太思想开明，但是对待婚姻一事上却十分保守。“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旧的看法，她常说道，一家的主妇如不替子女早点解决婚事，那就失了主妇的资格²⁵”。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悲剧是众所周知的，不但如此，鲁太太还迫使了小叔（夫弟）伯生也陷入悲剧境地。在作人的结婚问题上，鲁太太或许已经有了中意的人选，即使并非如此她也很可能不赞成娶异国贫穷人家的女儿。

但是即使母亲反对，数年前将自己的青春葬送于旧式婚姻而饱尝痛苦的兄长鲁迅必定是积极赞成的（可以推测，正因为如此，后来三弟健人与信子的妹妹福子的结婚问题上，因担心如此这样会被羽太家取而代之的鲁迅深深陷入了自我厌恶之中）。

婚后信子放弃日本国籍，两人在西片町波字十九号开始了新婚生活。翌月鲁迅回国，两人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二人生活。

b 对日本文化的倾倒

周作人可以说受了鲁迅阻碍的对日本文化的进一步的关心，因鲁迅的归国而一举开花。因所有的问题都要自己处理，口语的学习无论如何成了必要。对此，阅读当时的小说、戏曲等是正确的方法，但是范围过于广泛而无从下手，因而他决定将范围集中在诙谐作品上，从狂言、滑稽书、川柳、落语开始阅读。芳贺矢一编《狂言二十番》、宫崎三昧编《落语选》、《诽风柳樽》、《浮世风吕》等成了当时的教科书，其中取材于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的落语十分有益，他得空便去附近铃本亭的曲艺场（寄席）。他也曾读佐佐醒雪评译的《天之网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周作人渐渐迷恋于江户的平民文学与作品中描绘的平民的事态风俗本身。对江户平民文学的关心又唤起了他对保留着江户平民文学残影的明治新文学的关心。这便是以正冈子规始的写生俳句、写生文、兼具英国绅士的幽默和江户人洒脱的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等。写生文派的作品中，周作人很喜欢长冢节的《土》、《太十与其犬》、高浜虚子的《俳谐师》、坂本文泉子的《梦一般》，事实上他也用中文写了几篇写生文。因着迷于其文章和内容等，夏目漱石的作品，从《我是猫》、《漾虚集》到《三四郎》、《门》，他在偷懒上学等时，在旧麻布区的赤羽桥附近的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一一读过了。他尤其喜欢其初期代表作《我是猫》、《哥儿》，通过这些书籍的阅读增加了对日本的学生生活及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认识。

在东竹町、西片町生活的时代，夜晚闲暇时周作人常跟随鲁迅去逛本乡三丁目的大学路、神田神保町前街和后街的夜市和书店。他因此喜爱上了那条通过御茶水桥由甲贺町到骏河台下的路和经过阿部伯爵宅邸前的米楮树，越过天桥由森川町至大学前的路。鲁迅回国后，他体会到了一个人买书的乐趣，常常日夜不知疲惫地奔走搜寻书籍。

庚戌辛亥之交住在麻布区，晚饭后出来游玩，看过几家旧书后忽见行人已渐寥落，坐了直达的电车迂回地到了赤羽桥，大抵已是十一二点之间了。²⁶

住在麻布的时候，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离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车行要三十分钟左右，走过好些荒凉的地方，颇有趁火车之感，也觉得颇有趣味。有时白昼往来，则在芝园桥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车，进了山门，从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称得起城市山林，别有风致，²⁷

逛书店姑且不论，日本人中常见的对道路的喜爱中国人中是很少见的，周作人本身在中国也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周作人在怀念有着许多回忆的书店街、走惯了的道路等东京街景的同时，也深深怀念着日本吃食的味道，从信子做的油炸豆腐到今川小路的凤月堂、大学前的青木堂、本乡的冈野、藤村等店的日本点心都令人难忘。

周作人了解日本人情风俗的途径，除了文艺书籍、实际生活体验以外，还有

当时从事国民生活史研究、开始出版《远野物语》的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如此得来的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没有脱离后来所说的只关注了健全的“人情美”的乐观主义观点。给与了他重大冲击、引起了他人道主义关心的那起大逆事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对日本的信赖。与虽抱有怀疑感，但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却不肯正视这样否定的一面的周作人相比，采取只通过自己的文学课题接触日本文化，最初开始就直视其表面的鲁迅的日本观可以说是相当冷静的。

正因为“日本的人情美”是显示了文化的净化力的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日本人的信赖使他更加固了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沉溺于日本文化，又享受着婚姻快乐的周作人也绝未忘记祖国的悲惨情形，他一面在立教大学、东京三一神学校等处学习希腊语，一面翻译了匈牙利作家育凯摩耳的中篇牧歌小说《黄蔷薇》，为了介绍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打算开始学习法语。但是，这却相反地使他避免了直视中国现实完全躲在“梦”的世界里。

第三章 不参加辛亥革命之谜

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周作人夫妇回到绍兴后的三、四个月后的旧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革命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九月十四号浙江省会杭州解放。新闻传到绍兴，越社马上召开了市民大会。根据弟弟周建人所说，鲁迅被选为大会的议长后积极参加革命行动，周建人也于左右可以随时观察兄长的动向。只有周作人此间一步未出家门，见的人也只有偶尔来找鲁迅的范爱农一人。周作人虽然没有像鲁迅一样参加光复会的迹象，但是无论如何在南京和东京时代他是作为“民族革命的一个信徒”而从事文学等的活动的，因而不参加这次革命行动很不可思议。

迫不得已回国的周作人每天闷在家里帮助鲁迅抄写《古小说钩沈》、《会稽郡古书杂集》等资料的日子十分寂寞，他非常怀念东京的学生生活，觉得比在自己家里吃旧米饭好多了。这也是因为迎接他的是与“富于人情美的日本”完全不同的、与意在讽刺末期清朝的最后挣扎——欲设立自治制度——而翻译（两年前）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炭画》中的舞台羊头村同样，疲于异族专制统治的故乡的悲惨状况所致。在这种与祖国疏离而迷恋于异国的心情下，辛亥革命勃发时期，他写作了回忆往事的闲适清寂的写生文以寄托感慨²⁸。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大约一年前的庚戌年秋十月与妻子、重久等早出去尾久川（大隅川）钓鱼，途中在田端逢雨，遂坐电车至巢鸭，然后骑马返回西片町。

促使处于现实世界中，却无视现实沉浸于“梦”的世界的回忆中周作人“觉醒”的契机是革命的勃发和其进展。革命爆发约两周后的九月一日周作人写文章，表达不可能只写如“虹霓色”一样美丽的怀旧文的悲哀²⁹。周作人在杭州解放一周前的九月七日写作了一首哀伤的五言古诗。

远游不思归，
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
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
但令心暗伤。³⁰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在周作人处于觉醒中的并不愉快的意识里，清楚地展现出“梦”的世界，他努力将这个世界封闭于记忆的一隅，同时强制自己“觉醒”。这首诗作与发展至全国规模的革命进展无关，是当时仍旧将周作人吸引至“梦”的世界的留日生活的重要性的象征。

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周后迎来了绍兴的解放。然而周作人却不能完全摆脱出相反的文化冲击和精神虚脱的状态。这种强度的“留学病”更加增长了他对革命行动的消极情绪，因为这种革命行动必将带来幼年时代形成的对死亡的恐怖（以行使武力为前提的革命唤起的）、幼年时代的不安、对乱世到来的恐惧等情绪。其中当然也与妻子信子怀孕三个月有关（1912年5月16日长子丰一出生）。另外，周作人没有参加革命的原因还有着为了守家（包括延续血统）的积极意义。总之，万事都有兄长鲁迅的周到考虑，其结果是周作人将自己应起的作用名与实都限定于启蒙者（理性的反抗），忠实地施行着留日时期形成的以文学改造精神的思想。

回国后，周作人曾翻译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登载在《绍兴公报》上，讽刺清朝专制支配下国家的空虚本质。同年冬，他仿照鲁迅的《怀旧》写作了文言文《黄昏》，通过批判留日时风靡于清国留学生届的崇尚富贵利禄风潮，讽刺不光立宪派，革命派也深深沾染着富贵利禄思想的辛亥革命的本质。又针对民国成立后绍兴的政界、教育界的腐败堕落写作了短文《望越篇》³¹，一方面表示欣喜于共和制的成立，一方面对中华国民能否克服遗传的自然规律，改掉两千年专制政治下形成的“种业”支配下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新生，或者“抑仍将間間侃侃以求禄位乎”，报有疑问，表示了对革命前途的担忧。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一面表示了民国成立后高扬的革命风潮的背景下对民众的不信任甚至危机感，另一方面强烈突出对民国建设的希望。与此相比《望越篇》的论调虽说不上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从生物进化论的遗传论的角度观点显示了对大众的不信任感。两者的差别反映了执笔时期及所处立场等的不同。但即使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周作人的论调也还是不能脱离旁观者立场，这让我们联想到后来他不参与社会及政治活动，只过着普通生活的启蒙家的姿态。

周作人的理论认为，本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及社会改革要在长期的精神改革的基础上得以实现，而通过武力革命实现民族光复并非易事。对他来说辛亥革

命是发生过早的革命也是十分唐突的革命。所以此后周作人潜身绍兴教育界，致力于完成民族主义实现后以文学改革精神的主张中剩余的、充实共和制具体内容的文学、教育工作。

终章

周作人启蒙思想的特征在于其“民族自我批评精神”。对照西洋诸科学阐明中国文化的野蛮；看到日本文化中有而中国文化中没有的“人情美”。周作人自己将前者叫做“知”，后者叫做“情”。疏远祖国而亲近日本，周作人的这种“情”的根底里有着“民族自我批评”精神。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读下文引用的堀口大学的诗时有就像描写自己一样的感触³²。

在生我的国里
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作外国的
我的哀愁。

周作人曾说：正因为对祖国对故乡有“情”所以才会有抱怨和谴责。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其自身。

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和风俗习惯的憎恶与喜爱日本文化的“人情美”是相反的感情。因此，“日本的人情美”巩固了周作人的“民族自我批评”精神。另一方面，他对日本文化的倾倒与期待也长期掩盖了因大逆事件而产生的对武断政治的怀疑。不仅如此，“民族自我批评”精神也停留在一般论上，从未应用于周作人自身的问题上。他的“民族自我批评”精神的脆弱性和危险性便隐藏在这里。

注 本论文中，民国成立之前的日期除去使用日本年号明治及指明为阳历的日期外，均使用阴历，民国成立以后的日期均使用阳历。

注释

¹ 1964年7月15日执笔，寄给居住在新加坡的郑子瑜。

² 1901年4月（新历）以后长期在周家工作的用人王鹤照证言。“书〔王士青《鲁迅传》——笔者注〕上说，鲁迅先生家里原有水田四、五十亩，其实四、五十亩是没有的，我知道只有二十九亩水田。”（王鹤照口述、周芾棠整理《回忆鲁迅先生》（1960年修改。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1962年所收）二十三《尾忆》）。二十九亩也可以理解为周家没落后的数字，这里不采用这种说法。

-
- 3 据周作人《鲁迅与中学知识》（收于《鲁迅的中学时代》）。但是鲁迅《琐记》（收于《朝花夕拾》）中说求是中西书院“学费贵”。
- 4 据周著《知堂回想录》三五《学堂大概情形》。但是据同回想录中《琐记》记载，第一年只有银二两，最初的三个月见习期间津贴五百文。
- 5 据瞿立鹤著《清末留学教育》（三民书局，1973年）第五章《日本留学》中引《酌拟游学日本章程请设专员管理摺》。
- 6 《知堂回想录》七一《下宿的情形》。
- 7 同上。另外周著《鲁迅的故家》第三部《鲁迅在东京》六《校正》等中也有他们每年得津贴四百日元的内容。
- 8 据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九《归国在杭州教书》。
- 9 许著《我所认识的鲁迅》所收《关于〈兄弟〉》。
- 10 笔者推测，鲁迅德国留学梦想的失败（《著者自叙传略》）与许寿裳放弃留学有关。
- 11 鲁迅宣统2年（1910）7月11日给许寿裳书简
- 12 鲁迅宣统2年10月14日给许寿裳书简。
- 13 据《回忆鲁迅先生》十二
- 14 鲁迅宣统3年（1911）2月7日给寿裳书简。
- 15 鲁迅宣统3年闰6月6日给寿裳书简。
- 16 同上。
- 17 闰6月6日致许寿裳书简的开头有“两月前乘间东行，居半月而返”、“此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辗转而至”、末尾有“启孟及ノブ子已返越”的内容。以次推断，作人夫妇如与鲁迅同时回国，应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间；如果是迟于鲁迅回国应在5月中旬至闰6月初之间。在此据鲁迅宣统3年3月14日致许寿裳书简中“走日本，速启孟偕返”的说法，而采用了前种推断。
- 18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二——日本的衣食住——》。
- 19 同上。
- 20 于法政大学之后周作人入学的立教大学的学籍簿上记录为“明治41年7月，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预科结业”。这里的预科与《民报》第十六号（明治40年9月）及第十七号（同年10月）登载的广告《日本东京法政清国留学生预科招生本大学梅博士》中所说预科应该相同。该广告登载，该大学9月11日（新历）新设学习期间为一年的预科班，教授历史、地理等一般学科及日语，为进入学习期间为三年的大学本科专门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作准备。
- 21 光绪33年（1907）2月执笔。
- 22 载于《天义》第八、九、十卷合订本（新历1907年10月）。
- 23 载于《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订本（1907年11月）。
- 24 同上。
- 25 《知堂回想录》一〇五《去乡的途中（二）》。
- 26 周作人《东京的书店》（《瓜豆集》所收）。
- 27 周作人《留学的回忆》（《药堂杂文》所收）。
- 28 该文也可以认为是留日时代执笔，回国后重新抄写的作品。这里不采用这种说法。
- 29 《庚戌秋天钓鱼的记事·附记》。《知堂回想录》九二《辛亥革命（一）——王金发》中引用。
- 30 《庚戌秋天钓鱼的记事》中《附记》后的题诗。《知堂回想录》九二《辛亥革命（一）——王金发》中引用。
- 31 《知堂回想录》九五《望越篇》中引用。周作人在此推测该文的执笔时期为鲁迅在第五师范学校（民国以前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县署教育科长何几仲、县署第一科科长罗扬伯以及朱幼溪等的“桃偶”都出场后至鲁迅赴南京新政府教育部任职之间。周作人还推测，登载的报纸也非《越铎日报》，或许是《民兴报》。
- 32 见《怀东京》。

附记 本论文的日文原文原载于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野草》第二十二期（1978年9月1日发行）。本文为补订修改后的中文译本。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教授）

（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非常勤讲师）

2013年1月20日受理 2013年2月10日采录决定